

王 润 生 著

我 们 性 格 中 的 悲 剧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邵立辰
技术设计 欣 宇

《传统与变革》丛书
我们性格中的悲剧
王 润 生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15千字

1983年1月第1版 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册

ISBN 7—221—00135—9

B·07 定价：1.60元

目 录

序

第一章 导论	(1)
性格悲剧与悲剧性格	(1)
个人性格悲剧和社会性格悲剧	(5)
社会性格成因与社会文化	(9)
悲剧性格的衡量坐标和参照系	(14)
价值取向的历史性和性格评判的	
历史性	(22)
国情研究与性格反省和文化反省	(23)
悲剧性格研究的悲剧——方法的局限 ...	(29)
蛮荒之地的前驱者	(34)
第二章 欺瞒症	(37)
“面子”效应	(40)
假、大、空攀比	(46)
“剧场假相”	(51)
以善伤真，一个文化的检讨	(58)
第三章 近视症	(63)

一锤子买卖主义	(64)
“毕其功于一役”的暴发欲	(69)
“看客”是非观	(72)
通达、和事佬与扼杀“叫真”的文化 ...	(77)
体制、小农眼界及其它	(81)
第四章 非我症	(87)
自暴自弃的习俗	(89)
从“托古改制”到引证之风	(92)
全角色化意识	(98)
脸谱与模式	(106)
非个人权利的文化	(111)
第五章 不合作症	(118)
1 + 1 = ?	(120)
“公家的都是假的，唯有我的才是 真的”	(130)
“东方式嫉妒”	(133)
中国式的“人情”	(135)
血缘道德	(140)
第六章 良知麻痹症	(148)
例一：“爸爸，有警察，我推着走吧！”...	(151)
例二：“近山者仁、近水者智”新解	(153)
例三：“错就错在被人知道了”	(158)
耻感文化与奖惩式教育	(162)
第七章 守旧症	(172)

墨守成规与“正名”的把戏	(174)
开放的理性与封闭的经验	(178)
一个比较：中日维新的不同命运	(181)
一个综合性的病因分析	(185)
第八章 依赖症	(192)
我们的嘲讽和我们的骄傲	(193)
为依赖症张目的道德心理	(196)
家族主义老传统与“大锅饭”新传统	(199)
福利主义的教训	(201)
第九章 关于国民性改造的几个问题 ...	(205)
能否改造国民性	(205)
改造与顺应相结合的战略	(211)
社会体制改革与悲剧性格改造	(223)
重建伦理文化的一个设想	(226)
人格危机感教育与自我完善意识的	
强化	(236)
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239)

第一章 导 论

最熟悉的东西，老
是最不认识的东西

——阿兰·佩雷菲特

性格悲剧与悲剧性格

“性格”和“悲剧”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字眼。但是，把这两个词连用，组合成“性格悲剧”或“悲剧性格”这样的复合名词，却不大为常识所了解。而且，生活中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习惯对这两个词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譬如，一提到性格，有的人马上联想到的仅仅是这样一些个性特征：开朗与阴沉、内向和外向、活泼与沉静等等。这同心理学家赋予该词的内涵并不完全契合。因此，为了避免歧义和误解，这里不得不借用传统教科书的办法，首先明确一

下几个概念的定义。

关于悲剧的定义，迄今尚无统一的界说。哲学家和美学家历来就有多种解释。大而观之，至少可以罗列下述六种：一、认为悲剧根植于人的恶意和残忍（卢克莱修·桑塔亚那）；二、认为悲剧根植于人的同情和怜悯（博克）；三、认为悲剧是“善与善的冲突”、“是与是的冲突”（黑格尔）；四、认为悲剧就是正常人由于性格过失而使自己陷入悲惨的结局（亚里士多德）；五、认为悲剧是对求生意志的否定，是通过揭示生存的虚妄而获得解脱的一种审美活动（叔本华）；六、认为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

六种解释，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讨论问题，其中，一、二、五是对悲剧的审美心理基础所作的解释；三、四是对悲剧形成原因的揭示；只有鲁迅的解释是对悲剧本身的定性分析。

本书使用的悲剧一词系采用鲁迅的定义：生活中的悲剧就是“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而舞台上的悲剧则是把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之毁灭过程再现出来给人看。

作为一个全称归纳，这个定义的普遍适用

性是经得起经验的验证的。无论什么类型的悲剧，无论这些悲剧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也无论观众是抱着什么样的审美态度去观赏这些不同的悲剧的，这些悲剧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悲剧作者或者悲剧角色或者悲剧观众所认定的某种值得保留或值得追求的东西的丧失。当我们看到**秃**戴破毡帽、两眼迷茫、满面沟纹的老闰土时，我们之所以感到悲凉，那是因为我们难忘那童稚的、脸蛋红朴朴的、充满生气的小闰土；当我们为黛玉魂断潇湘，宝玉“剖心”哭灵，罗密欧与朱丽叶双双殉情而潸然泪下的时候，那只是因为我们“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当我们看到奥赛罗自杀而为之惋然长叹时，那是因为我们仰慕英雄或者多多少少也在做着英雄的梦。反过来，一个对生命、爱情、友谊、荣誉以及一切的一切无所眷念的人，他也就失去了体验悲剧感的所有养料。

悲剧的产生有多种原因。正如依悲剧角色的不同可以把悲剧分为英雄悲剧和普通悲剧两大类一样，依原因的不同，也可以把悲剧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窘境悲剧、命运悲剧、社会悲剧等等。窘境悲剧即黑格尔所说的由于“善与善之间的冲突”酿成的悲剧。电影《人生》中的

高加林不得不在事业和爱情之间进行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现代女性在“贤妻良母型”与“女强人型”之间徘徊犹豫，均属于这种悲剧类型；命运悲剧就是由于生活中难以捉摸的偶然性的捉弄酿成的悲剧。希腊神话中狄俄浦斯王，不自觉地杀父娶母，生活中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造成的生离死别，是这种悲剧的典型；社会悲剧则是由于社会或他人的不公、恶意或者愚昧给悲剧主角带来的悲剧。比如易卜生戏剧《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曼医生最后四面遭谤、走投无路，就起因于众人因自私而扼杀了正义；人们说尼采本人就是个悲剧人物，也是指由于习惯扼杀天才使他在生时得不到世人的理解。

但是，除了上述种种之外，还有性格悲剧。何谓性格悲剧？亚里士多德有个经典的描述：在这里，悲剧人物是“这样一种中等人：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但是他的遭殃也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和弱点”^①。

①《诗学》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4页

性格这个概念，心理学家的界说比常识所理解的要宽泛得多：性格就是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惯常的心理特征，其中包括态度特征、情绪特征、意志特征和理智特征等四个方面。假如把态度特征和情感特征合并为一项，也可以概括为知、情、意三方面。

倘若将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同鲁迅的定义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出性格悲剧的定义了：性格悲剧就是那种由于性格缺欠而造成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的悲剧。比如奥赛罗的自杀，固然由于别有所图者的阴谋，但也不能不同时归咎于他的轻信、多疑、猜忌和暴烈（或许还有他那深藏于内心的种族的自卑）。

反过来，我们又可以逻辑地推演出悲剧性格的定义：悲剧性格是指那种可能造成“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的性格要素。比如阿Q，倘若他明智些，豁达些，少一点自欺自诈、自高自大以及自轻自贱（奇妙的矛盾性格！）或许就不会落得法庭上画圈、断头台上挨刀的结局了。

个人性格悲剧和社会性格悲剧

舞台上的悲剧来源于生活中的悲剧。个人

性格悲剧在生活中到处可见。比如谁都会遭到挫折，面对同一挫折，不同的人反应不同，以正视、反省、坚忍、升华的方式来对付挫折的是健全性格的表现；以投射、抽离、否认、抵消、“合理化”、“酸葡萄态度”和白日梦等方式来对付挫折的就是悲剧性格的表现。一个大学生，因未下功夫成绩不好，假如他将此归因于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因而精力不济，那就是一种“合理化”反应；假如他全无根据地抱怨说，这是老师评分不公，就是“否认”态度；假如他因此在家里无端地向母亲、妹妹发火，那就是一种“投射”反应；假如他迫使自己去相信“高分低能”的神话，那就是“酸葡萄态度”（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假如他还要进一步相信“低分高能”的神话，那就可说是“甜柠檬态度”了，（不想吃酸柠檬，但自己只有酸柠檬，于是自己说服自己相信柠檬是甜的。）上述种种挫折反映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之为悲剧性格，是因为无论哪一种，对于遭受挫折者跨越挫折，实现自己真正追求的目标均有百害而无一利。

假如把细微的差别也作为分类标准的话，那么，分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多少

人，几乎就有多少种性格，这说明了个人性格的多样性。但是生存环境、条件、文化背景的相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在性格上也存在异中有同的一面，如果这“同”的一面不是生理上的自然原因造成的，而是特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那么，就可以把这称为社会性格（亦称众趋人格）。一个民族的成员所共有的社会性格称民族性格，一个国家的公众所共有的社会性格称国民性格，一个集团的成员所共有的社会性格称集团性格，一个地区的居民所共有的社会性格称地域性文化性格。鲁迅曾经谈到过南人北人、京派海派的差别，就多是从小地域性文化性格着眼去比较的。一个颇为有力的佐证是，当年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之后，不少人都认为鲁迅是指桑骂槐，借小说骂他们，因而恨恨不已。这固然说明鲁迅塑造的阿Q这个典型是“杂取种种人”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的人可以从同一个阿Q中观照到自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同一性。

同样也由于生存环境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的国民或民族其社会性格也各不相同。海涅曾经比较过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

的差异，认为法国人热情、豪放，英国人庄重、诙谐，德国人沉静、多思。有人还曾借一个寓言式的小故事来形容不同国家国民性格的差异：一个国际饭店失火了，用不着仔细观察也能猜出来——夺窗而逃的恐怕大都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崇尚敏捷灵活，随机应变；遵循常规找门出逃的恐怕是德国人，因为他们素来讲规矩；首先抢救父母的恐怕是中国人，因为他们讲究孝道。这种说法是否完全贴切姑且不论，用以说明民族性格有别，却是不无道理的。另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一位评论家曾经诙谐地把日本人比喻为一群游动的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直到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打乱了这个队列，它们就转变方向朝相反的方向游去，但仍然队列整齐，成群游动。”^①这里揭示了日本人作为组织人的合群性格。无论是褒是贬，把这个比喻移到大多数别的民族身上显然是不合适的。

正如个人性格有着长短之分一样，社会性格也有优有劣。凡是有可能妨碍实现某种既定

①[美]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

价值目标或者有可能导致既定价值目标丧失的社会性格，就可以名之为社会悲剧性格。

社会性格成因与社会文化

个人性格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遗传、社会文化、社会阶层因素、家庭教养方式、生理的成熟程度、出身序列等等，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个人性格的成型。此外，特殊的人生境遇更会对性格的塑造有相当的影响，如后娘的虐待或导致卑怯，或酿成倔强与暴虐，“一朝被蛇咬”造成“十年怕井绳”的怯懦，生理的残疾孕育出自卑或者孤傲，被人陷害过便多疑、猜忌、对人不信任等等。

影响社会性格形成的因素却没有这么复杂，就直接原因而言，主要有三个：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文化，三是社会制度。它们对社会性格的影响均通过一定的赏罚形式来实现。自然环境通过对个人行为的报答和惩罚来调整人的行为取舍；社会文化通过对个人行为的褒贬来调整人的行为取舍；社会制度则通过它对个人境遇的影响而调整人的处世之道。

赏罚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实质只有一

个 奖励给你渴望获得的东西，剥夺你不愿丧失的东西。它们所造成的心理反应也是同一的：顺利或挫折。没有人情愿自己渴望拥有的东西被剥夺，也没有人情愿遭受挫折，除非有一个更大的诱惑。因此，赏罚的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性质对个性的调整几乎具有决定性作用。

关于赏罚与行为、性格的这种联系，著名心理学家班都拉曾做过一个实验：将男女儿童各33名，分成3组，每组均分别看一部电视片，三部电视片的前半部分内容相同，后半部分内容不同。相同的部分是：一个成年男子走向一个大塑料娃娃，命令娃娃让路，娃娃不听，于是男子用不同的方式揍娃娃，如拳击鼻子，骑在娃娃身上用木棒敲击娃娃的头，并且边揍边骂。后半部分不同的内容是：第一组孩子接着看到：另一个男子出场，带着糖果饮料，酬赏攻击娃娃的男子（楷模——奖赏情况）；第二组孩子接下来看到的是：另一男子出场，斥责攻击行为，并把第一个男子打了一顿（楷模——惩罚情况）；第三组孩子在看完前半部分后，影片至此结束（楷模——无赏惩情况）。看完片子后，紧接着给孩子们设一单向玻璃房

（便于实验者从外面观察），房子里同电视片中摆设一样，也放着一个大塑料娃娃，然后让孩子们依次走进房间。结果发现，看了“楷模——奖赏”片的第一组孩子，模仿攻击行为最多；看了“楷模——无赏罚”片的第三组孩子，模仿攻击行为稍次于第一组；看了“楷模——惩罚”片的孩子，模仿攻击行为最少。但是，如果在试验前事先宣布，谁若模仿攻击行为谁就可以获得糖果，结果三组的模仿率趋于一致。^①

可见，行为和性格的形成也遵循着进化论的规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里的“天择”应当包括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的两方面）。

再以自然赏罚为例：一个野人，倘若三番五次地在肥沃的土地上发现了野生的沉甸甸的稻穗，恐怕就会萌发在这里种庄稼的念头；孩子们玩小刀割破了手，可能以后对锋利的刀刃就会取小心翼翼的态度；顽固地信守长辈们的耕种经验，倘若总有收获，必然会强化守旧的性格。自然的“不测风云”常常给人类带来毁

^①普汶：《人格心理学》中译本，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479页

灭性灾难，不能不迫使远古的人们对神秘的天地顶礼膜拜；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只给那些“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人以填饱肚皮的可能性，因此造就了人们的勤奋和耐苦精神……这些都是自然环境影响人的行为和社会性格的证明。

同自然赏罚相较，社会文化指令通过社会赏罚对个人行为和社会性格的影响要广泛得多。教育、习俗、舆论、行政手段等等，这一双双无形的手，一张张无形的网，一股股无形的驱动力，对个人性格的社会化具有极强的规范作用。哪怕你再自信，倘若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你是“笨蛋”，久而久之，恐怕你也不得不怀疑起自己来。近几个世纪来，黑人的自卑恐怕就来自种族歧视盛行的文化氛围。即使你天性放纵不羁，倘若让你处处碰壁，恐怕你也不能不有所收敛。中国的古训“众口铄金”至今看来还是有道理的，而且文化的制约力还不止于“众口”，而常常是“众手”，“众脚”并用。苏东坡有一首诗《洗儿》，能给我们极好的启示：“人皆生子盼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养儿愚且鲁，无忧无虑至公卿。”这是东坡先生的经验之谈，显然其中包含着深重的忧愤和不